



最新图文版

SHIHUA SHISHUO
XIHUATING

下册

李静 主编 李琦 等著

实话实说

西花厅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西花厅

实话实说

SHIHUA SHISHUO
XIHUATING

李静 主编 李琦 等著

下册

K827=7
Z763.0220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四章

盛开的海棠花



解放初期，周总理偶然看到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，就爱上了海棠花，也爱上了西花厅，在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西花厅里整整居住了26年。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、幽静、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。

❧ 张佐良说 ❧

周总理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，一住就是 26 年。陈毅说：“廉洁奉公，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。”

白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（六部口），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，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。

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，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。因年代久远，青砖灰瓦的屋宇，廊柱暗红陈旧，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，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。

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。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，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。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



❧ 周总理办公室外景。

道西侧，长廊中段设一凉亭，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，池子里没有放水，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，常年干涸着。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、亭子、长廊、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



周总理最爱海棠花开的西花厅。

旧，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，树木花草繁茂，修剪整齐，院内环境幽静，空气清新，略有一点花草芳香，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。

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，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，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。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，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，中央栽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。花坛亦是交通标志，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，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。

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。每年初夏时节，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，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，芳香四溢，引来无数彩蝶纷飞，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，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，蕴含着盎然生机。

后院的面积不大，是周总理办公与居住区。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，有几棵梨树、桃树和白皮松。周总理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。红色的廊柱，绿色的窗框，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，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。每当天空晴朗、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，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，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，室内光线充足，顿时亮堂起来。

周总理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“活动室”。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，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，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、史、哲类的图书。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“活动室”习惯地称之为“乒乓球房”，或干脆就叫“球房”。打乒乓球是周总理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。



西花厅外景。

常有警卫、秘书、医生陪他打球。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，活动不方便。我陪他打乒乓球时，他已年近古稀，不可能挥拍抽杀，就像董必武说的，是打“卫生球”。

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，东厢房为临时“客房”，来客做短暂住宿用。我在西

花厅 10 年只见过周总理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，未见别人来住过。

办公室往东是客厅，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“多功能厅”。这儿是周总理、邓颖超用餐、休息的地方，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，与亲属团聚所在地。邓颖超在此看电视。

由客厅往里（朝东）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。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总理的卧室，周总理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，这里有书架，存放一些旧书刊和文史资料类图书。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，谅必考虑冬季保温、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。

周总理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。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，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。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，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。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，生长于江苏淮安，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。

海棠花满西花厅。



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。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，周总理进卧室休息后，通向周总理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，钥匙由警卫员保管。

周总理若是夜间找人，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，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。厨师、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。

周总理居住在西花厅，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。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。自他住进来以后，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。



✎ 周总理的办公室。

60年代初，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，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物，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，更换了窗帘、洗脸池与浴缸。周总理回国见了十分生气，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。事后，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：“我身为总理，带一个好头，影响一大片；带一个坏头，也影响一大片。所以，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……你们花那么多钱，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，群众怎么看？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，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？”

周总理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。自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。

邓颖超在悼念周总理的文中说：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，就爱上了海棠花，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，选定这个院落，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，整整居住了26年。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、幽静、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。

正如陈毅元帅所说：“廉洁奉公，以正治国者，周恩来也。”

（张佐良，1965年至1976年任周恩来专职保健医生）

❧ 李琦说 ❧

周总理告诉我：“要采取措施，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。”

国事繁忙中，他依然不忘老朋友，总理努力使这些人“各得其所”。为了吸取教训，总理让我把检讨改成电报。

我是1950年初从地方上调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，既感到高兴又顾虑不能胜任，兢兢业业努力去做。就在我刚到不久，出了一个差错。

有一天半夜，正是我值班，总理交给我一份有关外交方面的声明，要求第二天见报。我照例封好，交给收发室就睡觉去了。

没想到第二天报纸上没有刊登。总理自然生气，要我立即查明原因，并嘱咐我要每个环节都查清楚。

我一查，原来是由于天气寒冷，汽车在政务院机关旧式库房里很久没有发动起来，等将声明送到新华社时已经晚了，错过了发稿的时间。总理想到我刚来，并没有过多地责备，而是告诉我：要采取措施，保证不再出现这类事。

我先给车房加大了炉火，很快又把那里改供暖气；同时建立了一套必要的制度，如文件发出后，要逐件检查送达时间，特别是对于即将发出的重要稿件要及时预告对方等等。后来，这些就成为秘书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程序了。

在这件事以后，秘书们仍难免发生差错，总理除了对负责人员进行批评外，往往是严肃地要求找出原因，想出改进办法，建立制度。尤其是在涉外领域出了差错以后，总理总是要求做到消除差错所造成的影响，最大限度地挽回损失。有时，总理甚至自己出面去补救，力求消除这种影响。这种事例就不止一件了。错了，怎么办？不是单纯批评，而是总结经验教训，找出原因，加以改进。这一点，我是永远铭记的。

我刚到西花厅时，每天都有大量文件送来，其中有一种材料记载着最近到京的一些人名。总理总要翻阅并且上面作些批示，如告统战部，如移住北京饭店，如派某某看望等等。

我当时不明白，总理这么忙为什么还要看这些材料？后来才清楚：这些人绝大多数同党关系密切，做过不少有益的事。周总理是党内了解民主人士最多的领导人，有些人的身份、作用也只有周总理最清楚。所以，在国事繁忙中，他依然不忘老朋友，并努力使这些人“各得其所”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总理不再看前面我说的这类材料了，而是移交给统战部去办了。在西花厅的近七年里，遇到的这些事有的我当时并不明白，也不理解，过后才逐渐明白、理解。有一些事，是在我离开西花厅，有了更多的实践和经验以后，才逐步理解，也对总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后，有机会接触更多的档案，能从历史的全面的角度去研究问题，才感到对总理有了更深的理解。

回忆我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七年，觉得总理很忙，很有才华，不分昼夜工作，对各个领域的事情，抓得很紧，处理得十分周到细致，有条不紊。他作为政府的大管家，也真是不容易，一般人难以做到的，他都可以做到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参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工作，从事党的领袖的研究，看了大量的文献，联系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来思考，对周恩来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，包括他的人格魅力的理解就更加深化了。他给我的印象就不光是过去形成了的负责政府运转的一个大管家



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繁忙，但是每一件事他都处理得十分周到细致。

了，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好人了。简单地说，我觉得可以这样来概括：周恩来是民族英雄、党的领袖、开国元勋、人民公仆、世界伟人。这个评价，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。

大约是1952年，我已逐渐适应了西花厅的工作环境，熟悉了如何处理一些日常事务。那一年，江西的邵式平来北京开会，打电话说想见总理。当时正是我接的电话，因为看到总理特别忙，就没有立刻报告。

等到我向总理报告时，总理说：“好哇，你跟他联系一下，约个时间。”

我赶紧同邵式平联系，一打电话，才知人已经走了，回江西去了。

我立刻向总理承认错误：“我看您太忙，不忍心打扰您。”

总理听后十分严肃地说：“你太粗心！我再忙，你也应该告诉我嘛！能否见他可以由我决定嘛。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总理对地方同志来北京要求见他的，一般都要想法接见，以便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我认识到错误后，立刻写了检讨。

总理批评我说：“你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有问题，看不清问题的实质。只是看我忙，就不分事情的轻重缓急。”

当时，我以为作了检讨，只要吸取教训，这件事大概就算过去了。

没想到总理严肃地指示我说：把你的检讨改成电报，文字简洁些。以你的名义发给邵式平同志，道歉！

这一下，我知道总理是真生气了。我当然照办。同时也明白只有这样处理，才能说明造成这次失误完全是由于我个人的过错。而我起初只想向总理有个交代就行了，却没有想到如何及时去消除因为我的错误而造成的不良影响。这件事给我的教训很深。

“我是总理，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，好让毛主席、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些大的问题。”

斯大林逝世，我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一次看到总理落泪。

有一次，周总理到广州休假。秘书们都为此高兴，因为大家感到总理太忙太累了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

在京的秘书们出于关心爱护，商议后给总理写了封信，大胆陈述，要求今后改进。

过了不久，就收到总理的回信。

回到北京后，谈起这件事（至今，我还记得当时总理是在屋里边踱步边谈话）。他用很轻的声音问我：“李琦，这么久了，你还没理解我啊。”

我当时确实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意思，只好继续听着。

总理说：“国家刚建设，我是总理，我应该也必须多做些具体的事，好让毛主席、少奇同志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多考虑些大的问题。”

这话虽然很简单，可我在当时的确是不可能懂啊。直到后来，才逐步理解周总理这句话是多么朴素而又多么真实、多么深刻，有着何等丰富的内涵！它充分反映了周总理一心为党为国的崇高品德，反映了他的大公无私、他的伟大。

1953年，报纸上刊登了斯大林病重的消息。当时斯大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着崇高的威望，大家的心情立即沉重起来。周总理也不例外，非常关注这一事态。3月4日，总理临去睡的时候，在他的办公室特地嘱咐我万一斯大林逝世了要办的几件事。我一一记录下来。当他走出办公室门口回过头来，看到我还拿着记录纸呆立时，很有感情地对我说：放在口袋里吧，人还没死。

就在第二天清晨，传来了噩耗。我悄悄地走进总理卧室，轻轻地向他报告，这是我第一次去卧室向他报告事情。然后，我等待邓小平副总理的到来。当时，周、邓都在西花厅办公，共



斯大林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。

同使用我们这个秘书班子。邓到后很快就按照周总理的意见着手办理了。其中有一个简单的给毛主席、中央的建议，要立即打出来给主席送去。但是打字的同志却总是打不好。平时总理对打字要求很严，我不得不手改错字，送给总理，并代她们做解释。出乎意料的是总理看了一下报告，拿下自己的眼镜，擦了泪痕，低声说：她们也很难过，就这样送去吧。这是我在七年中唯一的一次看到总理落泪。

以后，中央经过讨论，组成以周总理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吊唁。当时，收到许多群众来信，建议以这样那样的办法来纪念斯大林。有一位同志写信给总理，主张改某一街道为斯大林街，总理立即要我打电话，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办。

在斯大林得病和逝世前后，晚上值班时，总理和秘书们很自然地谈到斯大林。我印象比较深的有这样几点：斯大林是功大于过的，不能全面否定，要历史地看待人和事；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也是一个犯了错误而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。总理也不止一次谈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正面和负面的影响，并很明确地说，那时中国共产党不成熟，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。总理还非常强调每个人，特别是领导干部绝对不能盲从，要学会独立思考。他还一再强调要坚持走群众路线，说苏联抛弃了群众路线，而毛主席、中国共产党却发展了群众路线，群众路线千万不能丢掉，党一定不能脱离群众。

回忆斯大林逝世后，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，全面否定斯大林，以致造成苏联国内思想混乱，成为苏联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我们难道能不警惕，不从中引出应有的教训吗？

总理的和蔼使我很快进入了角色。总理面有愠色：

“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。”几个钟头的会议，他竟能准确记住每个民主人士提出的问题。

1954年，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的消息发表后，有不少同志写信给周总理，其中不乏知名的党内外人士，希望能够做一名光荣的人民代表。总理认为这些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人民代表的产生和推选是神圣的，不能由个人随意确定。对于这些来信，他往往是批交中央组织部处理。

我在总理办公室近七年时间，始终同人事部门保持联系，这是我分工的任务之一。我清楚记得总理对干部的任免，一直是依靠组织，绝不个人擅自决定。就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，有一天，我正在办公室陪着总理批阅公文，忽然保密电话响了，总理接过来谈了几句，忽然声音提高，说



周总理在会议上作报告。

的话大意是：我无权决定，你的要求我可以转达，你一定要安心工作，不得马虎。放下电话后，总理说：我这个人从来是对越熟悉的同志越严格，不要想钻空子，利用我的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谁要想经过我这里爬上去，那是妄想，趁早离开我这里。看来总理为这事很生气。

平时，总理是很平静的。有一天，他从外边回来，一进门我就感觉有些不对劲。进到办公室后，总理面有愠色，一边打开皮包拿出文件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我这个人犯过不少错误，都是政治性的。”接着抬起头来，发现我跟着进办公室了，就对我说：“有人要我任用几个私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我绝不会犯组织性的错误。”总理说话时，还有些气愤和像受了侮辱似的神情。我觉得这话的分量太重了，根本不敢再问一句，立刻拿出需要批示的文件送给总理。的确，党内外任何人都一致公认：周总理大公无私，从不任用私人，没有自己的所谓小圈子、小集团，光明磊落。他赢得了全党、全军、全国人民的爱戴，成为我们永远应该学习的楷模。

在西花厅七年，我深感到总理十分注意培养干部，特别是给青年干部创造成长的机会。

总理管理的事务繁多，包括内政、外交、军事、文化等各个方面。平时，各方面工作都有专门的秘书负责，但夜班只有一个人，各类问题都要处理。

第一次值夜班，我感到面临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繁杂，心里实在是忐忑



1949年9月17日，周恩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报告，宣布筹备工作胜利完成，正式定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。

不安。总理知道我是初次遇到这种情形，又知道我来自农村，对许多事情不了解，因此对我态度非常和蔼，尽量消除我的紧张心情。在说到需要记录的一些事情时，他总是说得很慢，以便我能跟上他的口授速度。在批文件的时候，他也不像平时那样快，而是批完一件后，告诉我这个文件是怎么回事，应当注意些什么，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等等，然后着手批第二件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慢慢地，我进入了角色，不再感到紧张，也逐渐熟悉了夜班的工作方法。多年以后，我想起当时的情景，才明白总理这样做，其实有着更深的用意——他是在利用一切机会，培养秘书思考问题和处

理问题的能力，这不仅给秘书们创造了提高的机会，也因此提高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水平和效率。

说到这里，我要特别感谢于刚对我的帮助。在我值夜班之前，他就详细地告诉了我夜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，如何分清哪些文件是重要的、紧急的，对于总理的意见，又应该怎样准确完整地记录下来，夜间要发送的文件怎么发出去，等等。有了他的这些帮助，再加上总理的耐心教导，我在第一次值班时，总算没有出现什么纰漏。

总理主持政务院工作时，除不定期举行三五个人的小型会议外，还定期地举行每周（或两周）一次的政务会议。会议由总理、副总理、政务委员组成，有关的部长、副部长列席。总理对政务会议十分重视。

我到西花厅不久，就参加了一次政务会议。进门后，我远远地坐在后面，很快就发现有很多的知名人士出席，郭沫若、黄炎培、章乃器、罗隆基、史良等都来了，真是英才荟萃，让人眼花缭乱。事隔几十年，我对那次会议的具体的议程已经记不清了，但那天会场上十分热烈的气氛，却令初次参加高级国事会议的我十分难忘。众多党内外人士，特别是民主人士聚在一起，认真地听，认真地议，没有任何拘束，有时候为一个字都要争论。总理

则边听边记，在会议的最后，针对大家的意见作总结性的发言。他的总结入情人理，娓娓道来，既把党和政府的政策做了宣传，又把党外人士、下级人员的一些好的意见吸收进来，一些疑点也讲清楚了。总理高度概括的能力非常强。在长达几个钟头的会议结束时，他总能抓住主要问题和争论焦点，清晰地阐述自己的意见，尤其是能准确地记住是哪个民主人士提出了哪个问题，甚至谁说了某个字、某句话，并在做总结时照顾到。这一点颇令我吃惊。

在政务院时期，举行政务会议是重要的政务活动。可以说新中国建立初期的许多事，方方面面的，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讨论、研究。政府发布的决定、指示、条例等等，大致都要经过政务会议研究后正式发布。绝大多数的会议是由周总理主持。在会上，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，到会者畅所欲言，周总理也一再鼓励发言，虚心听取意见。那种协商讨论的气氛，直到现在想起来仍令人神往。

(李琦，1950年至1956年任总理办公室秘书、副主任)



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部分委员合影。前排左起：林伯渠、司徒美堂、李济深、朱德、毛泽东、张澜、刘少奇、何香凝、高岗；二排左起：陈铭枢、陈嘉庚、李锡九、董必武、沈钧儒、彭泽民、黄炎培、马叙伦、沈雁冰、高崇民、陈叔通、张难先；三排左起：谭平山、张治中、程潜、李烛尘、郭沫若、吴玉章、李立三、章伯钧、张东荪、徐特立、蔡廷锴；四排左起：邓小平、陈毅、张云逸、周恩来、赛福鼎·艾则孜、马寅初、陈云、彭真；五排左起：刘格平、刘伯承、薄一波、贺龙、聂荣臻、张奚若、傅作义、乌兰夫。

❧ 张文健说 ❧

“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。”他批评几位部长，
“党还没有走，国家还没有走，你们为什么提前走？”
对给他开路的警卫干部大发雷霆：“你们要不请前面的
代表先进会场，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。”

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，周总理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提醒我们警卫人员：
“你们不要只记得我是总理，还要知道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，一个普通的
劳动者。”有一次，他还明确具体地说：“在国务活动时我是政府总理，在党



内活动时我是一个普通
党员，在群众活动中我
是一个普通劳动者。”

我不能深刻理解他
的话，就去请教邓大姐。

邓大姐说：“他是提
醒你们，不要只想他是
总理，他是党的副主席，
而忽略了他还是一个普
通的共产党员，一个普
通的劳动者。”邓大姐还
特别强调：“他是人民的

邓大姐十分了解周总理，他们不仅是工作上的好同志，也是
生活中的好伴侣。

公仆，而不是人民的官老爷，你们牢牢记住这一点，就不会给他搞特殊化，
使他脱离群众了。”邓大姐的教诲使我恍然大悟。

原先我认为，正是因为周恩来是党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，党才派我
们来保卫他的安全。虽然我也知道，警卫工作既要保证安全，又要方便领导
联系群众。但是，当安全与联系群众发生矛盾时，我们总是坚持“安全第

一”，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；而脱离群众，那是受批评做检讨的事情。当然这种认识有极大的片面性，不过，当时确实就这么想的。

在50年代初，毛主席就批评说：“警卫工作是隔在党与群众之间的一堵墙。”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密切联系群众的周总理来说，他不会容许他身边的警卫人员成为他联系群众的“墙”。所以他经常教育我们，不要特殊化，不要使他脱离群众。



1973年，周总理在首都机场庄严告别宾客。

1956年2月19日，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郊机场送一个外国代表团。当客人的专机刚离开停机坪，几位部

长和高级将领就离开送行的队伍，向自己的汽车走去。周总理十分恼火，大声疾呼外交部礼宾司长：“你给我把他们叫回来。”走的几位同志回来了，周总理当众批评：“党还没有走，国家还没有走，你们为什么就提前走？”又说：“送行的人要等客人专机起飞后，并在空中盘旋一周，以示告别，那时才能离去。”周总理当众批评几位领导同志，他是在执行总理的职权。

1964年9月，全国人大、政协开会期间，周总理到北京饭店新楼参加人大小组会。现场的警卫干部和指挥交通的同志一见周总理的车子来了，马上把其他代表的车子指挥到边上停住，给总理的车子让道，还把正要进饭店大门的代表阻止在两旁，好让总理先进会场。

这时，周总理的汽车在离饭店门口很远的地方停住了。他走下汽车，站在那里，双手叉腰，大发雷霆。他说：“代表们都是来开会的，应该按先来后到的顺序进入会场。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汽车往前指挥，把其他代表的车子压在一边？你们为什么让已到门口的代表站在门外等候，让我先进去？”他指着自己站的地方大声说：“你们要不请前面的代表先进会场，我决不离开此地一步。”

这时，车辆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多。还是郭沫若副委员长有办法，他来到周总理跟前，拉着总理的手说，还是大家一起进去开会吧。于是周总理和郭沫若等人一起走进了北京饭店的大厅。